本书其实是余英时（本该尊称先生的，但依照笔记的惯例，而先生又无字行世，恕笔者直以名称之）“自传”的上半部分，截止在博士论文的写毕，下半部分唤作“谈话录”，内容结构的安排上也有所区别。

我向来是热衷于阅读传记的，高三临考前一本《史记》便翻得不亦乐乎。短短数十万字乃至千字间，记载了人一生的浮浮沉沉，风云际会。愈是在历史中有大作为的人物，经历往往愈是曲折，掩卷常常感慨良多。如果说传记的主角本人，对事件的感受最为深刻，那么付诸于笔端，再为读者所读到，中间又经历了一番转换的工夫，读者心中感性的、难以被清晰把握的想法往往要多于能被记录下来的文字。

余英时的回忆录，是属于这一类，能带给我大收获的传记。这里简单提及两处颇为触动我的地方。

首先是作者在书中提到，自己早年间，有过两次影响人生轨迹的“千钧一发”时刻，一次是由于机缘巧合，恰好未搭乘最终失事的飞机；另一次是在原本计划从香港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最终决定留在香港。上述两件事，可供亲历者做选择的时间窗口都极为有限，可以说，稍不留神，历史便要变个样子，我们也就读不到这本回忆录以及现在已成为学术史标杆的那些著作了。这无疑令我深深感受到，所说的“天命”，这是与孔子所说的“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类似的精神。其实，“天命”未必要指代什么人格化的上帝，或是早已为所谓“冥冥中的力量”安排好注定要发生的事件，单单是那些具有重要影响与重大意义的事件本身所要求的众多巧合，偏偏是在无数排列组合中可能性至为小的那一个得以发生，这一事实即足以引发我们思绪的激荡与对未知的敬意。

另一处，则是钱宾四与作者之间的师生情谊。钱宾四的师友之情，已在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和宾四自撰的《师友杂忆》中有所呈现，作者在本书中的回忆，又是一个极生动的补充。读罢，不免油然生出强烈之向往，大概近代以来的师生间，最近与当时孔子与弟子间情形者，或许要首推宾四。今日读来，真有若恍如隔世之感慨，不知此般融洽和谐之景象，尚有复见亲历的机会乎！